

容闳和中国近代留学教育

广州市教科所 庄佳骝

容闳(1828—1912)字纯甫,号达萌,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今珠海市南屏镇)人。少年时就学于澳门马礼逊学校,1847年在美藉校长勃朗的帮助下赴美国留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1854年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参与洋务运动,并组织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学生,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作出开创性的贡献。晚年,他将本人一生的经历,用英文写成《西学东渐记》一书。

一、容闳的留学教育观

(一)留学的目的论。容闳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创始者,他在《西学东渐记》自序中说:“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他倡导留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了“改革和复兴中国。”

容闳出身于贫穷的农民家庭,中英发生鸦片战争,使他在童年就眼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看到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人民生活穷困。他留学美国时,身在异邦,心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国,并立下救中国的宏愿:“予当修业期内,中国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遂觉此身负荷极重。”^①他眼见西方的教育发达,科技先进,国力强盛。对比自己的国家,朝廷腐败,人民饱受煎熬。他决心从教育入手来改造中国;通过教育,掌握西方学术,走向文明富强:“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料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予意

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②

他回国后,偕同美国教士、友人曾恒忠赴南京考察太平军,拜谒洪秀全的族弟、干王洪仁玕,提出7条建议:(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支良好军队;(2)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3)建设海军学校;(4)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6)颁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7)设立各种实业学校^③。这些建议,除了《圣经》一条是专门为太平天国立言外,其余各条都是当时中国要走强国之路所必不可少的措施。其中有关教育的就占了四条,可见,通过教育改造中国的理想,在容闳心中是热切的追求。

他的建议得到洪仁玕的赞许,但未能实施。后来他进入上海海关,看到海关总税务司为外国人所控制,中国人常受欺侮,更加坚定通过教育救中国的理想:“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了解公权私权意义,任何人敢侵犯其权利,必有胆识起而自卫。”^④

1863年,容闳受两江总督曾国藩之召,入总督幕府。曾国藩当时正以“自强”、“求富”为标榜,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特别要发展军事工业制造洋枪洋炮,容闳乃建议:发展军事工业首先必须建立机器制造总厂,作

1252

为一切机器的母厂。曾给予容闳全权到国外采购机器,容闳再涉重洋,购得机器于1865年春回国,在上海城西北的高昌庙设机器厂,名为江南制造总局。

容闳继而以江南制造总局为据点实施他的教育计划,达到国家富强昌盛的目的。他向曾国藩建议在工厂旁设立兵工学校,得允。不久,中国第一所兵工学校成立,招中国学生,授以机器工程的理论,进行实验,为中国培养不少机械工程师。江南制造总局的教育事业不断扩大,除兵工学校外,还设立翻译馆、操炮学堂,成为中国洋务教育的重镇,容闳在洋务运动史中扮演了“开荒牛”的角色。

事业有了立脚点以后,容闳进一步拟定派学童出洋留学的计划。他撰写了条陈四则,正式提出“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⑧这条陈于1870年由曾国藩带头签名上奏朝廷,很快得到批准。1871年容闳拟定实施派遣留学生的章程,由曾国藩、李鸿章领衔上奏朝廷,进一步阐明派遣留学生,“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⑨

从以上分析看,由容闳首倡的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目的,是:由政府派出留学生去谙悉西人擅长之技,以渐图中国自强;容闳倡导的是教育救国论。

(二)留学的方法论。容闳不但倡议留学教育,而且制订了详细实施的方法。在他首次撰写的“条陈四则”就提出派遣留学生方法的设想,包括:(1)人数为120人,分为四批,每年派30人;(2)学习期限为15年,学生年龄定为12~15岁;(3)派出汉文教习同往,使学生可兼习汉文,设留学生监督二人负责管理;(4)留学经费在上海关税项下提拨。

由于派留学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没有

现成的规章,经常受到朝廷顽固派的非议,使派遣之事遇到不小的阻力。容闳不怕困难和挫折,对派遣的方法精心修订,拟出更完整的计划,列成《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仍由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章程共十二条,其中第一条按照当时国际交往的正常程序,照会美国驻华公使对待留学生“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⑩“其束修膏火一切均中国自备,并请俟学识明通量材拨入军政船政两院肄习。至赴院规条,悉照美国向章办理。”章程第二条写明幼童留美需经考试,家长要写志愿书。“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其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局考试。”^⑪这一条也是非常重要,写明选学生出国留学必须经考试选拔以保证质量。

章程十二条是容闳原来的条陈四则基础上修订的,更加完整、周全。章程上奏后,奉旨交总署议奏,总署再知照曾国藩、李鸿章修订章程。1872年容闳又拟出《挑选幼童及驻洋应办事宜》6条,作为章程十二条的补充。不仅写明留美学生选拔的细节、驻美期间学习的汉文学科、应行的礼仪,而且还规定学生归国后应为国家服务:“候总理衙门酌量器使,奏明委用。此系选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亦不准入籍外洋,学成后不准在华洋自谋别业。”^⑫这里明确规定了官费留学生对祖国的义务。

容闳倡导的派遣留学生在方法上是慎重的,经过他本人的草拟和修订,逐渐趋于周密、完善,他强调国家利益,希望出洋留学的儿童,将来学成归来能报效祖国。

二、容闳倡导的留学教育的实施

清朝政府首次派遣留美学生的方针既定,即任命官员开始实施:(1)指定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为驻美学生的正监督,江苏候补

同知容闳为副,常川驻美办理学生的学习、生活事宜。(2)在上海设立出洋局,由盐运使銜候补知府刘翰清主持,办理学童的挑选、考试。(3)任命曾恒忠为翻译、叶源瀚为出洋教习。

派留学生的方针政策业已确定,工作机构也已建立,便着手招生选拔,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在19世纪7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落后,风气未开,信息闭塞,以至选拔幼童出洋留学的消息鲜有人知。长期闭关自锁,造成世人毫不了解西洋国情,招生之初,有的地方传说“西方野蛮人会把小孩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⑧;加上政府要求幼童的家长写志愿书,表示在其子弟出洋留学15年间“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⑨,吓得报名的人又撤销,故第一批30人招不足额。容闳亲自到香港,在英政府所办学校或教会学校挑选一些中英文均有一定基础的学童补足人数。

1871年容闳在上海设留美学生预备学堂。各批幼童赴美之前先进预备学堂学习中文和英文,时间为一年或半年,出洋之前须考试检查学童的文化水平。在全部120名幼童中,广东省籍占84人,广东籍中又以香山县人最多。按照朝廷的章程,其年龄应在12至16岁之间,但实际上所招的学童,抵达美国时的年龄有18名是11岁,有7名是10岁。1872年8月,首批中国学童30人由陈兰彬带领在上海登上邮船启程赴美国。在此之前,容闳已先行到美做准备工作。学童到后,先在新英格兰分别寄宿于美国人士家中,每家二、三人,彼此相距不远,后迁往哈特福德市。

学童年龄差别大,到美国后,有的进入小学,有的进入学馆,年龄较大者进当地中学。学习科目有英文、普通西学,兼习“中学”包括《孝经》、《小学》、《五经》、《国朝律例》、《圣谕广训》等科目;还有《作文》、《小楷》。洋务派根

据国内洋务事务的扩大和变化,指示留学生监督令高年级学生选择国内急需的煤矿开采、运输及五金制造等专业,各习一艺。120名幼童中到1881年进入大学肄业者有60余人,学习专业有铁路工程、电讯、法律、机械、开矿等。如詹天佑1872年到美国,开始就读于西海文小学,后进入纽海文中学,中学毕业后考取耶鲁大学,专攻铁路工程专业。

1873年起连续3年,每年均按原计划30名派遣,在美的学童人数逐年增加。1874年由容闳提出申请并获李鸿章批准,在哈特福德市建造了一幢坚固漂亮的楼房,作为留学事务所办公之用,兼容学生的膳宿。容闳建房的目的是使留学事务所在美国根深蒂固,足见他的深谋远虑。

但是,朝廷中的顽固派一向视西方文化为洪水猛兽,将派遣留学生看作离经叛道之举,一开始便对其攻击和责难,多方设置障碍。而洋务派支持容闳的目的,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即既要西方的“船坚炮利”,又要竭力保护传统的封建文化,排斥西方思想文化。当留学生的行为超越他们设定界线时,他们便和顽固派站在一起刁难留学生。

留学美国的幼童,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在行为上不受儒家礼教的约束,触犯朝廷的清规戒律。陈兰彬以及留学生新任监督吴子登均为朝廷的顽固派人物,思想守旧。他们对留学生的言行经常吹毛求疵、诸多挑剔。如吴子登曾对陈兰彬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能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⑩他们不断致信李鸿章,对学生的行为大加诬蔑捏造,并指责容闳管理不善,致使李鸿章改变对留学生的态度,依顺顽固派的主张。1881年奉朝廷之召,全部在美的留学生

凄然返国。容闳倡导实施的留学教育,未足15年的期限就半途而废了。

三、容闳开创留学教育的历史意义

由容闳倡导,组织和参与管理的中国首批官派留美学生未完成全部学业而归国,这是历史的遗憾。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深叹留学生“全数遣回,甚为可惜”,批评洋务派“浅尝辄止,贻讥中外。”^⑧爱国诗人黄遵宪诗云:“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⑨代表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呼声,对朝廷守旧势力的严正批判。

留学教育的计划虽然中途夭折,但它毕竟加速西方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为后来中国的留学教育开辟了道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和海军骨干,在洋务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

容闳组织学生留美学的初衷是为国家储蓄人才,以西方学术改造中国。留学生归国时,恰逢洋务运动如火如荼,各个部门急需掌握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的人才。归国留学生中有一些在美国的大学肄业,他们在铁路工程、煤矿、电讯、船政、机器等专业学有专长,回国后有用武之地,在美国未进入大学的归国留学生也被朝廷分别安排在电报、船政、机器、海军等部门服务,在将先进的生产手段输进中国的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作出突出的贡献。如后成了铁路工程师的詹天佑凭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担起建筑京张铁路的重担,在没有外国人参与的情况下,依靠中国工人提前完成艰巨的工程,并节约了大量经费,在中国铁路史上立了丰碑。又如黄耀昌等7名归国留学生被安排在唐山煤矿,成为中国

首批煤矿工程师;在电报业方面有多名留学生担任各省首任的电报局长,使中国的电报系统摆掉了外国的干预。

海军建设方面,归国留美学生贡献甚大。归国初,有41人安排到海军舰队及其附属单位服役,其中有多名担任舰长,吴应科、徐振鹏担任过舰队司令。这些海军军官不少人参加过中法海战、中日甲午战争,有的在保卫国家的海战中壮烈殉职。

其次,留学教育接受西方文化,加速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留美学生接受西方教育,除了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外,还亲身体验过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受过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回国后他们作为西方思想文化和政治学说的宣传者,由于他们身历其境,对国人宣传西学更有说服力,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有力冲击封建统治阶级保守顽固势力的根基,为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作出了贡献。

顺应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清朝政府及后来的民国政府在用人政策上也改变因袭的守旧的习气,重视启用具有新思想、德才兼备的人。这批归国留学生中好多人后来成为政府官员,如梁敦彦曾任职两广总督府,后来任外交总长;唐绍仪曾任驻外公使,后来为外交部次长;袁世凯时代任内阁总理;容耀垣曾任孙中山的顾问;还多人为驻外公使或外交官员。这些人能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再次,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具有创先启后的意义。中国首次官派留美学生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掀起了中国近代留学运动的第一波。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政府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急切,派出留学生去谙悉西人擅长之技的事,决不能因召回这120名留美学生而禁绝;据统计,在洋务运动期间,经洋务派奏准或直接派遣的官费留学生共达

209人。甲午战争后留学欧美、日本的学生人数持续激增。据1909年的统计,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达800名左右,而在日本,中国留学生人数达4000人,这是近代史上中国留学教育的第二波。五四运动前后又兴起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据1921年的统计,在法的中国学生达1700余人,形成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第三波。毫无疑问,容闳组织留美是学习西方的一个创举,为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开创风气,作了有意义的尝试,发挥着创先启后作用。

近代留学生不仅学习了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而且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回国后对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起着重大的作用,他们有不少人成为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还有一些成为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有一些人成为反清革命的志士,辛亥革命与近代的留学教育养成的人才有着密切的关系。留学教育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作出的贡献,正如舒新城于1926年所说:“无留学生,中国的新教育

与新文化不至有今日。”^⑭容闳倡导和组织了中国首批官派留美学生,其历史功绩是不能磨灭的。

注:①、②、③、④、⑤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26页、第27页、第56页、第46页、第102页

⑥、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二册,第153页、第166页。

⑦、⑩陈琼莹著《清季留学政策初探》(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初版,第7页、第36页。

⑧、⑨、⑮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台湾)中国出版社,第7页、第11页、第1页。

⑪阮芳纪等编:《洋务运动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第441页。

⑬郑观应:《易言》,考试上。

⑭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罢美国留学生感赋》。